



常德市文史資料

第二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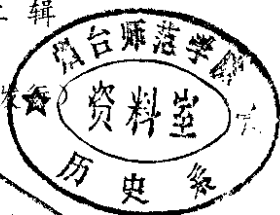
政协常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民建常德市委会 常德市工商业联合会

97122/106

常德市文史资料

第二辑

(内部发行)



政协常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民建常德市委员会、常德市工商业联合会

一九八六年元月

写在前面

常德民族工商业是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官僚资本的内外夹击下发展起来的。它对于常德城市之形成及城市经济之繁荣，对湘西、川黔边境地区经济之影响，均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本辑的内容主要是，记述了一九〇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常德经济发展变化和商务总会产生的概况，以及常德解放后市工商联三十五年的光辉历程，介绍了本市一批有代表性的行业史和一些具有声誉的厂、店在旧社会挣扎求存的经营管理经验。

编印这辑工商史料，旨在使读者了解常德经济发展变迁情况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和掠夺常德人民财富的罪行，深刻认识和理解党的统战政策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历史题材；同时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搞活经济、振兴常德提供借鉴。

本辑稿件系由市工商联、民进会的几位同志提供。对于他们积极撰写史料、关心和支持文史工作的可贵精神，在此谨向他们深深表示敬谢之意。

工商史料是研究我市经济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加以年深月久，档案资料匮乏，肯定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们殷切地期望着广大读者和工商界老同志对此提出批评和建议。

编 者

目 录

常德商会会史·····常德市民建、工商联文史工作组	(1)
常德市工商业联合会的三十五年 ·····市民建、工商联文史工作组	(28)
典当业的兴衰·····张俊涛	(87)
钱庄的兴起与变迁·····胡建武	(93)
粮食业的往昔·····胡建武	(97)
机杼之声话土布·····胡建武	(100)
绸布业百年史略·····张俊涛	(103)
常德解放前的电力工业·····刘元惕	(108)
常德之信托、保险、堆栈、囤船之概述·····胡建武	(111)
百年老店吉春堂·····胡建武	(117)
泰记福百货号与燕春舫·····胡建武 刘元惕	(119)
聂振茂药号的兴衰历程·····聂庆钧	(123)
城乡知名的刘义茂线号·····胡建武 刘元惕	(134)
华晶玻璃厂的经历与变化·····易正文	(137)
抗战时期的计口授盐·····刘元惕 张俊涛	(146)
商办乞丐收容所史话·····张俊涛	(148)
同善堂创办始末·····刘元惕 张俊涛	(151)
忆商办商业学校·····张俊涛	(154)
川军在常德横征暴敛的片断·····张俊涛 刘元惕	(159)
解散袁祖铭部队的见闻·····张俊涛 刘元惕	(162)
光明的历程 终身的幸福·····谢海泉	(165)

常德商会会史

常德商务总会的建立——常德县 商会的结束

(一九〇五年——一九四九年)

第一章 常德商业的早期繁荣与 商会前身——会馆的建立

常德居于沅水下游，扼洞庭湖西北之口，历史上曾为川黔要道，湘西土特产品的集散地和交通枢纽，素有“湘西门户”之称，是常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据史载，清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年）城内即有药材行。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年）以后，牙行逐步增多，其中以谷米、棉花、桐油、土靛、冰碱、药材等行业较大，这些行号大都开设在大河街一带。城区内仅谷米行就有一百多家。每年沅水上游各县及川黔边境所产之桐油、木材、土产山货……均顺沅水运达常德，湘西北的慈利、石门、桑植、龙山、大庸等地的土特产品，大都沿陆路用车载马驮、肩挑背负，源源输入。而滨湖各县之农产品亦由河湖港汊运来本市行销。市面店铺众多，商旅云集。清咸丰五年（一八四三年）“百货、盐、茶厘税，

每税约纳银十余万两。”鼎盛时期，进出口货物总值年达三千三百五十三万多银元。据一八六三年《武陵县志》描述当时交通畅达商业繁荣的景象是：“大舟小艇聚城旁，上溯黔阳下武昌”。

由于常德物资丰富，交通便利，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即“乾隆盛世”时期，各地和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海外贸易在闭关政策的束缚下有了一定的发展。许多城市的商业出现了繁盛的气象。这时，江西、安徽、广东、山西、陕西、福建、湖北、河南等省来常定居经商者日渐增多。他们各擅一业，为了讨论行情，整理行规，抵制外帮的竞争，扶植本帮在商界的势力，并作为同乡人来往住宿、贮货、交易以及酬神、议事、宴乐的场所，开始按省、县乡土关系和同行关系组织“会馆”。据《武陵县志》记载，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常德的江西籍人在大河街设有“江西会馆”；安徽籍人在井巷子设有“徽州会馆”；山西、陕西籍人在常澍街设有“山陕会馆”；江苏籍人在城东设有“江苏会馆”；广东籍人在大庆街设有“广东会馆”；福建籍人在铁家桥设有“福建会馆”。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湖北籍人在城东设有“湖北会馆”；河南籍人在水星楼设有“河南会馆”。尔后，本省籍人又分县籍在上南门设有“辰沅会馆”；在城东设有“衡永郴会馆”；在南站设有“宝庆会馆”；在河洑镇设有“靖州会馆”；在麻阳街设有“麻阳会馆”；在大高山巷设有“长郡会馆”。“会馆”经费来源有三：①基金捐款；②常年捐款；③临时捐款。兴建“会馆”之后，绅商们还集资修建了“育婴堂”、“同善堂”、“休仁堂”。故有“八省三堂”之称（一九一一年《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

“会馆”是经过稟官立案的，它受到官府的保护。“会馆”的首领称为“老总”，大都由富商绅士所担任。其职责是：掌管会产，主持祭祀，调解同业纠纷。会馆每年举行一次年会，一般都在祭神之日如农历三月十五日“财神会”、七月十五日“烧包会”、八月十八日“杜康会”、八月二十日“赵公会”。有的会馆还每月举行一次或两次例会，公议行情市价、调解同业争端、商讨改善经营、修订行约店规。如《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中例述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常德丝业修订旧规七条，布店重订条规十二条，违反规约的，根据情节处以罚钱、罚戏、罚酒席，或钱、戏、酒并罚。因此，会馆具有很大的制约力量。它既是行帮组织，又是商人团体。即使后来成立了商业同业公会和商会，但会馆作为每一省、县籍人的帮派组织形式，并没有因此而解体，却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才告结束。

第二章 市场的扩大与常德商务 总会的产生

第一节 随着市场变化，商会应运而生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全面加深，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从沿海伸展到广大内地。继长沙开为商埠后，英、日商人得陇望蜀，进一步要求开常德、湘潭为商埠。湖南巡抚端方屈服于帝国主义的要求，以“各国约开口岸，……动多牵掣，诚不如自开商埠，犹足雇主权而防流弊”为由，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三月十一日上奏

清廷，将常德准为自开商埠，并将常德沅水南岸善卷村一带划为“各国商家租建之区”，“至该处关务监督，常德应归岳州关监督兼办”（见《端忠敏公奏稿》卷5第5—6页）。清廷同年七月准端方所奏：“如所议行”（见朱寿明著《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95）。但遭到常德商民强烈反对。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正月，岳常澧道韩庆云来常德筹办通商租界事宜，群起集会呈文“具控到京”，且“邀集郡城八省三堂董事，在育婴堂会议商埠事宜”，计议向韩庆云“面陈利害，并公禀省城洋务局力争”（见光绪三十二年元月二十五日《长沙日报》）。致使常德自开商埠未果。但外轮则根据《内港行轮章程》，行驶常德运输客货，并在沿河两岸租栈房及码头，成为外商“寄货港”（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59），外商便籍此以长沙为中心，形成了包括岳州、常德、湘潭等地的在湘经营网络。自此常德便成为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的据点，市场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

1、各国洋行林立。英商有“安利英”、“亚细亚”，美商有“其来”、“福中”，日商有“日华”、“三井”、“三菱”，法商有“立兴”，德商有“美最时”、“瑞成”、“彩松”，还有欧洲犹太巨富“老沙逊”等十九家洋行。他们在常德倾销车糖、颜料、煤油、布匹、百货、香烟、肥田粉；收购桐油、倍子、牛羊皮、肠衣、猪鬃、芝麻、蚕豌豆、药材及朱砂、水银等土特产品。英商安利英洋行还兼营水火保险业务。同时，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和日商“戴生昌轮船公司”，还凭仗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行驶常德——长沙——汉口线。为了垄断我国

内河航运业务，他们开始实行“不收乘客船票”、“途中吃饭不收餐费”，最后竟采取“全部免费，另赠一条毛巾”等手段，拚命排挤本地新兴的“富利轮船公司”、“普济轮船公司”、“民众轮船公司”、“震兴轮船公司”等民族航运企业。

2、进出口贸易繁荣。川南、黔西以及沅水上游辰、西两河的桐油、牛皮、信子、冰碱、生漆、矿砂等都运集常德，由洋行收购出口，全年出口贸易金额不下数千万银元。据一九三五年《桐油》杂志记载：“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以前，常德为本省桐油之最大市场，……其业务之盛，达到了极点，”“年购销量约在三十至四十万担之间”。同年九月《上海总商会报》称：“常德为我国桐油市场第二位集散中心，仅次于四川万县”，并指出这个时期“是植物油的黄金时代，也是整个常德市场的鼎盛时期”。

上述地区的土特产品在常德销售后，又就地购回上布、匹头、百货、南货、棉纱、棉花、食盐、食糖、颜料、瓷器五金等物资。因此，从常德输往湘西及川黔边境地区的工业、手工业产品和原料数量也相当大。如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常德销往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棉花约有十万担、土布约有百万匹、麻一百六十万斤。据《中国实业志》载：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以前，常德棉花营业异常兴旺，出口量达二十万担。其他，谷米出口年达五十万石，鱼二十万担，皮箱七千口，牛皮六千张。

3、工商业户不断增多。清末民初，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国家正忙于战争准备，暂时放松了对我国的侵略。因此，这时我国民族工业、手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

展。常德地区虽无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形成，但手工业特别是手工染织发展很快。染坊达八家之多，织布机户有五百余家，织布机有一千一百多台。织布工人（不包括业主及家属）约五百多人，除此之外，铁器、木器、竹器、园木器、白铁等作坊也相应得到发展，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创办了刘义茂线厂，生产丝帕，加工各色丝线和棉线等产品；还兴办起碾米、电光布、卫生巾、皮革、造船等手工业工厂和企业公司达四十余家。与此同时，兴起的金融业异常活跃。据一九三四年《常德工商业现况》记述：“民国之初，常德银钱业，一时颇有蓬勃气象。钱庄计有三十家之多，官钱局有二，一为湖南官钱局，一为裕宁官钱局。”商业更趋兴旺，仅经营南货的就有一百多家，其他诸如桐油、棉花、棉纱、药材、山货、谷米、水产、皖碱等行业达三百家之多。并且出现了一些商贾大户，如经营土布发家的“李亨太”、“蒋万新”，都拥有数十万银元的资金，还有号称棉纱大王的“戴荣庆”纱号，积累百万资财的“谦记绸布号”等。

4、商会开始建立。清朝政府为了企业振兴实业，谋求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设立了商部。并于一九〇四年初，制定《商会简明章程》，同年三月又制订《大清商务总会章程》，发布“劝办商会谕帖”。为了鼓励各地商人公举会董，速订会章，以期上下一气，官商一气，实力整顿，广开利源，规定各府州县均应设立商会。商会分为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及海外商务总会。商务总会设在省会或者商业繁华的地方，商务分会设在中小城市。为了给予商会较高的社会地位，规定各董常川来署，不必穿公服，稟复各件亦不必拘

以公牍体制。商务总会只对总督巡抚用“呈”，对布政使、按察使以下地方官用“移”，表示同等地位。在清政府的上述倡导下，常德商人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秋季开始筹备工作，次年初，报商部批准设立了“常德商务总会”，地址设东门永安街（今人民中路市物资局地址）。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政权担心商会的权限过大，对己不利。于一九一五年正式公布了新商会法。按照新的商会法，商会分为总商会与商会两部分。总商会相当于以前的商务总会，商会相当于商务分会。在这期间，常德商务总会又呈准改组成立“常德总商会”，蔡正潜为总商会会长，会董五十名，会员向一般商人打开了大门，增加到八百六十五名。会址仍设在原商务总会。直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起，常德总商会几经改组，先后推选李宇田（安徽人）、蔡子陶（江西人）、罗紫庵（江西人）、郑莲荪（江西人）、曾春轩（江西人）五人依次担任常德总商会会长。被选出的会长多系大商贾和帮派势力强的头面人物。

总商会任务：1、筹议工商业之改良与发展；2、负责有关工商业的征调及情况通报；3、介绍和指导对外贸易；4、调处公断工商业的纠纷；5、调查统计工商业的情况及筹募工作；6、开办工商业补习学校；7、请准设办工商业之公共事业；8、负责筹捐派款等。总商会对商人的职责为“提倡保护，代为申诉，平值市价，修订各业规则”。

总商会成立后，对缓和帮派、行业之间的互相倾轧，抵制洋货，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二节 “五四”运动时期 总商会开展抵制 仇货的斗争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六月十五日，常德发生维持国货风潮，学生在城内府坪一带宣传抵制日货时，遭该处日商嘲讽，致起冲突，群众将府坪之新隆、下南门之丸三、常清街之弘旗各日本洋行门首玻璃窗格等尽行击毁。”“六月二十九日，日本兵舰隅田号开来常德，向常德人民示威。”（《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常德总商会在学生掀起“抵制仇货，提倡国货”的爱国浪潮影响下，成立了“国货维持会”。在商民中开展了提倡国货、查禁仇货的宣传工作，并将查出从日本输入的海带、白糖、布匹等都集中在下南门外和泮池坪予以当众烧毁，以示告诫商民从此不要再贩卖仇货，应大力推销国货。这一爱国行动，获得了全市人民和工商界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但是也有少数商民暗中违抗，将日货贴上国产商标，企图鱼目混珠逃避查处。“抵制仇货，提倡国货”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原洋货充斥市场的现象大为减少，国产工业品在市场的销量逐渐增大。全市部分手工业如毛巾、袜子、雨伞、绣花……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初，因收回旅顺、大连及否认“二十一条”，全国人民反日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三月二十九日，湖南工团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教育会、商会等发起收回旅大示威运动，组织“湖南外交后援会”，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常德行动最为激烈。六月五日，常德日清公司及所属“湘江轮日人打伤常德检查日货的学生十三

人，激起了常德人民实行罢市罢工罢课三日，要求驱逐日人出境。对日轮运卸货物，购办食品，均严行封锁。日人窘急即请求赵恒惕政府镇压常德人民的爱国行动。因此，学生与驻常德之湘军唐生智部（发生）冲突，唐部士兵竟暗杀学生一人，杀伤二人，且武装迫使各校学生离校”（载《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

第三节 军阀混战中 商会困于支差派款

自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袁世凯派汤乡铭为湖南查办使后，从此湖南遂为北洋军阀所盘踞，战争连年不断，政局变化无常，常德一直处于军阀混战之中，经常出现城门紧关，街头戒严，谣言四起，行人狂奔的惊恐现象，弄得全城时而闭市，商旅畏缩不前，百业凋零，市场萧条。不仅如此，大小军阀还凭借武力，对商民巧取豪夺。商会常年为过往军阀支差派款所困扰，如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四川军阀部队由贵州进驻常德后，找总商会派款二十万银元，限期三天交足，否则市场受扰，概不负责。当时总商会会长曾春轩为了息事求安，维护商民利益，再三要求减少派额，不仅未获应允，反而被扣押起来作为人质。总商会迫于这种情况，乃召开紧急会董会议，硬性议定向花、油、靛、碱、土布、匹头、钱庄、银楼、百货九大行业强行摊派，由川军派兵上门督催。如期交足后，才赎回人质，使常德市民避免了一场兵灾。又如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农历腊月二十七日晚七时，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部属教导师师长周润奉命策谋，在总商会设立的“商事研究社”（现城东贺八巷小学地址），巧设“鸿门宴”，捕杀贵州军阀国民革命军右路军总

司令袁祖铭，双方在城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刹时战火弥漫，兵慌马乱，溃散之兵趁机抢动，市面秩序混乱不堪。这时，总商会为了维护市面安宁，避免商民受损，乃出面调停，由商会发给缴枪游勇每人十块银元，作为遣散费，并告示安民，这样才收拾了残局，使市面得以恢复正常，工商各户安全复业。

第三章 大革命时期的商民协会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秋季“五卅惨案”以后，北伐军攻下长沙，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全省农工商学各界组成了反帝反军阀斗争的联合战线，工农运动形成高潮，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省各地。常德商民在中共湘西党务办公厅主任滕代远的领导下，建立了“常德商民协会”，公推贺洪泰南货店青年店主贺凤章为商民协会委员长。当时“关于商民运动决议案”中规定：“商民协会会员，不宜脱离现在商会，并须同时积极谋商会之改革与刷新，商民协会在不妨碍全体利益时，须与商会合作”。然而，由于总商会会长曾春轩系英商买办、亚细亚洋行经理，在革命群众运动兴起之时，吓得潜逃上海，其他会董亦各散四方，总商会会务实际上陷于瘫痪。

“商协”规定牧师、买办、劣绅、贪官污吏、外国商人不得参加。其主要任务是：保护商贾正当利益，禁止滥税滥票，反对奸商操持金融、垄断粮食；查禁兜售洋货，鼓励经销国货，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商协”还印刷了“五十枚”、“一百枚”票面的流通纸币作为活动经费。并且组

组织了“商协”纠察队，配合店员工会经常在街头巷尾宣传国民革命之意义，劝导商人大胆经营。同时查禁洋货，打击投机商人。玛瑙巷易万顺碓槽坊使用大秤称进，小斗卖出，克扣群众利益。他们发现后与之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将该店老板捆绑游街示众。对查抄出来的仇货当众烧毁。对于外逃商人的铺店进行封存保护，责成看店人员将店主找回开门复业。在此期间，为了声援“湖南工农商学大联合”反对英帝国主义帮助北洋军阀扰乱北伐后方和“反赤化”的革命行动，“商协”还积极支持和参与了“常德雪耻会”组织的反帝斗争。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城，白昼戒严，大肆屠杀。五月二十一日早晨，国民党何键所属熊震部队将常德所有革命团体包围起来，工人纠察队进行抵抗，遭到机枪扫射。当日，打死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八十多人。同年农历六月二十七日，由于叛徒周丽生的密告（周系江西吉安人，在小西门内经营南杂店，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熊震调一个连的兵力，团团包围商民协会，把正在主持会议的贺凤章逮捕入狱，严刑拷打。六月三十日，国民党常德县政府以所谓暴徒首犯罪名，将贺凤章杀害于下南门城门口。刑场上，贺凤章脸不变色，从容就义，时年三十六岁。解放后，追认为烈士。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国民党政府下令撤销商民协会，各地商人统一于商会与工商业同业之下，从此商民协会的名称方告消失。

第四章 马日事变后 市场时盛 时衰 商会几经改组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实行经济自由放任政策，爆发了第二次世界经济大危机，美国工业生产下降46.2%，德国下降40.2%，法国下降30.9%，英国下降16.2%。其影响很快波及常德，首当其冲的是桐油出口贸易锐减。当时常德地区十三家油行，不审时度势，盲目购进。结果货不畅流，资力不足，不得不将两万桶桐油以每百斤三十五元（银）作八折用款质押与聚兴诚银行。接着桐油价格不断下降，聚兴诚银行又以油价每松一成，追索押款头寸一成。最后迫使油行按汉口行情每百斤二十一元的价格抵还押款。这样，整个油行业资金损失了百分之八十左右，十三家油行就有八家倒闭。正由于油行业的不景气，带来了各行各业的不景气。

直到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世界经济危机过去，各业开始复苏。据《中国实业志》载：这一年“常德城区二十九种主要商业，共有商店八百七十八家，资本总额二百四十七万三千多银元，营业额达九百零二万五千多银元。

从这一年起至抗日战争前夕，桐油价格特好，每百斤由四十元逐步上升到六十元（银元），从而又推动了各行各业的新发展。牙行已有四百五十家，旅栈有七十家，茶楼酒馆有二十八家，较大的绸布号有十八家。其他如谷米、棉花、茶油、中药材、竹木、牛皮、朱砂、水银等，年营业额就为一